

## 东学党反洋教原因初探

邵 雍

1894年初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起义的目的是“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sup>①</sup>起义军的锋芒既指向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也指向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所有洋人。因此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东学党人的排拒。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东学党反洋教的原因,亦可从某一个方面来考察基督教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在东学党留下的原始文献中,“洋倭”或“倭洋”均特指日本侵略者。如东学党檄文中提出“三、驱逐洋倭,澄清圣道。”<sup>②</sup>又东学党曾向全罗道监司建议,“同心协力”,“扫破倭洋”<sup>③</sup>。然而东学党的矛头同时还指向了其他洋人,带有盲目排外的倾向。据1894年3月袁世凯电告,“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造有揭贴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詈骂,称将逐杀。在汉(城)洋人均大恐。”<sup>④</sup>明治27年7月24日《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原文是汉文的东学党条目中亦有“各国人商贾,在各港口买卖,勿入都城设市,勿出各处任意行商事”等内容。1894年4月12日东学党起义军在与政府军作战取得黄土岬大捷后发布了攻击基督教和外国人的揭示,全文照录如下:

为教头晓谕事,尔等侧耳听此。气数降衰,世道凌夷,含庙堂之垢,藏污之化,以许匪类通款之诚。然而,设馆传教,和约中在所

不许。尔辈肆然接踵而来,名曰敬上帝,但以祈祷为文,虽称信耶稣,但以赞美为法,绝无正心诚意之学,毫无践言笃行之矢。虽曰孝敬父母,但生无供养承顺之道,死无哭泣奔丧之节,斯可谓彝伦之常欤。婚姻之俗,则初以野合,终为改嫁,少不愆意。则有休离之弊,斯可谓夫妇之道乎。尔辈本以乞丐之类,尔会中贫卖例给之银,驰心于居处饮食之华美。初以习英语,教汉文,招诱良家子弟,究竟迫入尔辈之教中。且于学徒之供给,教办之群会,除饭剥衣,何鄙陋之足耶。曰其传道者,只以游览印经卖书等事为第一紧要。若有永苦之地狱,尔辈必先入之,可不恐惧哉。今焉敢请来办,岂可以我修道之学,与尔牟利之事,同坐交舌哉。如是晓告尔辈,速治装,归本国。否则,当以我忠信之甲冑,仁义之干橈声罪。以此知悉。<sup>⑤</sup>

上录《揭示》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学党人的反洋教倾向。接着要讨论的是东学党人的反洋教有没有合理的成分。

### 二

笔者认为,东学党人的反洋教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

首先,基督教进入朝鲜与外国侵略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天主教第一次传入朝鲜是在壬辰倭乱时期。1592年4月丰臣秀吉派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朝鲜。在朝鲜北部焚烧劫掠,仅在晋州一地就屠杀了朝鲜军民6万人。后因朝鲜各地组织义兵抗击加上明朝又派来了援军,有力地阻滞了日军进攻,并在

1593年初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南部沿海一带。正是在日军凶锋受挫,士气低落之际,天主教神父塞斯佩代斯和修士不干应日本军方之邀进入对马岛和庆尚道熊川,对日军将士进行宣抚,同时开始对朝鲜俘虏进行最初的传教工作。天主教传教士就是这样伴随着血与火踏上朝鲜这块土地的。早期的新教传教士进入朝鲜也不光彩。1866年7月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搭乘美国船“舍门将军”号非法进入朝鲜水域,船每次停泊靠岸时,托马斯“都要把传教书籍分送给周围的人们。”<sup>⑧</sup>由于美国船扣留前往交涉的朝鲜官员,抢劫商船,又以武力威胁要求金银人参大米,结果被激怒的平壤军民焚毁,托马斯连同全部美国船员丧命他乡。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签订后,美国传教士率先在朝鲜登陆。1884年美国监理教传教士麦克莱经金玉均介绍,面见高宗,获得了在朝从事医疗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许可,为在朝鲜传教打开了局面。同年金玉均等开化党领导人依靠日本军队发动甲申政变,政变被清军粉碎后金玉均亡命日本。由于投靠了人民所痛恨的日本侵略者的金玉均形象不佳,他所介绍的美国传教士自然也不会引起朝鲜人民的好感。

另外,自1876年朝日签订江华条约之后,美、英、德、俄、意、法等欧美国家先后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随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各教在朝鲜的逐步合法化。开始有了某种特权的基督教传教士对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朝鲜民众产生了不小的心理冲击力,因此在朝鲜被迫开放之初,也发生过几起教案。

其次,朝鲜基督教徒中有少数叛国分子,他们的卖国行径伤害了全体朝鲜民众的民族感情。1801年朝鲜发生了辛酉教祸,教徒死难者达300多人。当时在地洞中躲了8个月的教徒、庆尚道昌原人黄嗣永与残存的其他教徒密谋策划,为传教信教自由不惜借用外国武力。为此黄嗣永用蝇头小楷在白绢上写了一封长达1.3万字的外交书信,向驻北京天主教会本部求援。信中提出:“一、朝

鲜在经济上薄弱,因此呼吁西洋诸国援助,以求得到弘传圣教的资本。二、朝鲜奉行清国皇帝之命,所以要求清国皇帝下令,使朝鲜接纳传教师。三、要求清朝与朝鲜合并,朝鲜国王娶清朝公主为妻,统一衣冠。四、要求西洋派大舰数百只和精兵五、六万,以及大炮和其他军需兵器威胁朝鲜国王,使传教士能自由出入朝鲜。”<sup>⑨</sup>如此赤裸裸的卖国书信被查获后,引起了朝鲜朝野上下极大的震惊,就是“同情西教的部分国民也为天主教徒的卖国行径感到愤慨,没有一个人对黄嗣永一党的穷途末路表示同情。”<sup>⑩</sup>事隔60多年之后,天主教徒南钟三又秉承在朝鲜的法国教会的意旨,在1865年俄国舰队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之时,向实际执政的大院君提出与法国结盟、借用法国的力量抗俄并以此解决传教合法化悬案的外交计划。曾经和南钟三有过密切交往的大院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断然拒绝了这一计划,并因此对教徒实行大规模的屠杀。1866年,法国政府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亚细亚舰队司令罗兹率领七艘军舰和六百水兵袭击江华岛。正当朝鲜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外敌入侵之际,天主教徒4人竟然在鼎足山战斗中里通外国,危害本国。法军被击退后,这些卖国教徒“以与法军通谋罪被处以枭首刑”<sup>⑪</sup>,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再次,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异域的文化与朝鲜固有东方型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朝鲜,不少人认为基督教来朝鲜是为了传播伪教义,以异端蛊惑民众。早在18世纪朝鲜学者洪正河就著文《证疑要旨》,认为耶稣士的行为与儒家学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今也离国,则去君矣;别父母,则去亲矣;别兄弟,则去同气矣;不娶,而去夫妇矣;无后,则去子姓矣;所不去者,只有朋友一伦”。<sup>⑫</sup>当时在朝鲜不祭祀祖先是犯罪行为,然而天主教会明令禁止信徒保留祭祀祖先仪式,对此朝鲜实学派巨儒安鼎福进行了批判和抨击。安鼎福认为天主教反对偶像崇拜,但它供奉十字架和圣母玛利

亚像,同样是偶像崇拜。天主教徒谴责祖先祭祀自己却相信鬼神。基督教新教注入朝鲜已是19世纪80年代了。在教会的要求下,朝鲜的新教信徒们废除祖先祭祀,冒渎祖先,此外他们非但不向城隍堂或神庙牌位叩拜,反而砸烂或烧掉偶像。这些过激的举动自然引起广大不信教民众的极大反感和愤怒。他们将教徒从族谱中除名,赶出家门,不许教徒种地或往教徒家中扔石头,实行武力袭击等。至90年代,教会方面被迫让步,在理论上承认应孝敬父母,但正如东学党《揭示》指出的那样,“生无供养承顺之道,死无哭泣奔丧之节”,没有任何切实具体的措施,因而这种承认仍是抽象的、空洞的。

此外,按照朝鲜自古以来的风习,男女从七岁开始就不能坐在一起。但新教在做礼拜时男女是坐在一起的。尽管教会方面考虑到了当地的风俗、在做礼拜的男女教徒座席中间拉起了幔帐,但还是引起了一些守旧人士的猜疑和非难,指责教会导致男女杂处,伦常混乱甚至“野合”等等。

为了占领思想阵地、广传教义,1881年在朝鲜的各教派传教士商定,由大英圣书公会负责圣书出版事业。1889年朝鲜圣教会正式成立后,致力于基督教的文学活动,至1893年刊行了安德伍德的《基督教原理》等12种传播用书。安德伍德本人还受命负责《圣经》朝文版的翻译工作。鉴于在朝鲜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上层统治阶级中传教阻力仍然很大,1893年在朝鲜传教士召开的第一次传教士议会上确定了以劳动阶级和妇女为重点传教对象,一律用朝鲜文出版宗教书籍,培养朝鲜国人传道等传教的策略方针。在此之后建立起来的教会多数不是由外国传教士建立,而是由朝鲜本国教徒向他们的邻居、朋友、亲戚及商业伙伴宣教并使之入教的。朝文宗教宣传品的大量刊行和朝鲜本国入自建教会的逐渐增多,进一步加强和加剧了西韩两种异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故东学党《揭示》指责基督教传道者“只以游览印经卖书等事为第一

紧务”,并诅咒说“若有永苦之地狱,尔辈必先之。”其实在反洋教方面,东学党和大院君是一致的。据日本驻朝鲜公使井上馨报告,“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他,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sup>①</sup>。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大院君和李埃榕曾暗中派人去煽动该党”<sup>②</sup>,与之内外呼应。

第四、东学党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认同于天主教,遭到查禁迫害。东学道是庆尚北道庆州人崔济愚融合儒、佛、道三教于1860年创立的。崔济愚认为,“儒教拘于名节,未达玄妙之境;佛教入涅槃,绝伦常;道教悠游于自然,缺乏治国平天下之术”<sup>③</sup>,均有不足。但“儒佛纵是天道的一部分”<sup>④</sup>,应以“诚、敬、信”教人。东学道这一名称本身就暗寓于西学相对抗之意,道首崔济愚在布德文中宣称,“古道衰弱,西教乘虚而入,因而国运危险。……信我教者即能避免疾苦,享受天命。西教是亡国家、灭百姓的邪教。”<sup>⑤</sup>但是崔济愚在布道时多次使用了“天主”一词,如在他创造的21字咒文“至气今至愿为大降。待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sup>⑥</sup>中有“天主”二字。崔济愚还向他的信徒们宣称,“天主突然降临他的草堂,授以不死仙药和咒文,命他代天主布教济民。”<sup>⑦</sup>从表面上看,东学党与基督教似乎都信天主,为此东学道曾遭到儒生的误会和政府的镇压。1864年道首崔济愚被政府逮捕处死。在官方眼中东学道是天主教道的同道,都是惑世诬民之邪教。在1866年大院君对天主教徒展开大屠杀时,东学党的处境也十分困难,第二任教主崔时亨被迫隐居英阳,全道只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住地。1892年道徒徐介周首先提出,当今罗马天主教会宣教的禁令已被解除,却只对东学道施以严禁是不当的。在徐介周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崔时亨在同年11月起草了给全罗道观察使的上诉书。书中写道吾师崔济愚“生在东方,学在东方,东方何能成为西方?”并对“现在列邑守令将我们的道视为西学余派,随意逮捕残虐,榨取钱财”表示不满。书中还称东学道“意在使人改过自新,忠

君教亲,尊敬老师,亲近朋友,别无他意。”<sup>①</sup>全罗道观察使经过东学道人12月间的两次请愿后,态度有了改变,最终发表了禁止迫害东学道徒的声明。“以讨倭斥夷”为旗帜的东学党就是从上述控诉申冤运动逐步演变而来的。历史事实表明东学党的天主决不等于天主教的天主,东学道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与天主教势不两立。但因种种原因,天主教解禁之前它和天主教同遭取缔镇压,天主教解禁之后它的命运地位却并没因此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东学党除了与当局抗争之外,对于连累它们的天主教自然不会有任何好感的。在对外宣传方面,东学党急于辩解与天主教毫无关系,宣称“岂可以我修道之学,与尔牟利之事,同坐交舌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三

综上所述,东学党人的反洋教倾向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东学党人反洋教的思想武器是极其陈旧的。所谓“以我忠信之甲冑,仁义之干櫓”是根本无法抵御外来宗教势力的侵略的。按东学党的设想,断绝与外国人的来往,停止贸易,返回锁国的闭关状态是不可能的。而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的西人全行斩尽杀绝或赶出朝鲜也是办不到的。东学党的基本群众是广大的农民,此外前来归附的还有城市贫民、没落两班、儒生、乡吏等等。但在道首崔时亨的主持下,东学党对本国封建统治者没有完全放弃幻想。东学党人明知“现今之臣,不思报国,徒窃禄位,掩蔽聪明,阿意谄容,……不念保国安民之方,……惟某偷生之方”<sup>②</sup>,但还是上书全罗道监司,“伏愿阁下同心协力,选有忠有义之士吏,同遂辅国家之愿”<sup>③</sup>,共逐倭洋。至于同大院君联络,更是所托非人。

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据汉城发动宫廷政变后,整个朝鲜政府几乎完全操纵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8月末正当东学党起义军首领全璘准集结十万大军准备自全罗道

北进驱逐日军、推翻政府时却遭到了教首崔时亨等人的无理阻挠。他们以使用暴力和武器为教义所禁止为词,多方迟滞起义军的进攻,致使起义军丧失战机,最终被日军和朝鲜政府军所镇压。东学党的反洋教斗争未及全面展开即随着起义的失败而告结束。

甲午战争后朝鲜实际上为日本所控制。基督教各教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情并支持过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斗争,它们与朝鲜人民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不能据此推论,在甲午战争之前基督教各教派在朝鲜的传播也都是受人欢迎的。

(作者系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邮编:200234)

①东学党檄文,转引自《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近代部分下册。

②《东京日日新闻》明治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③《东京日日新闻》明治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④李鸿章呈总理衙门电(1894年3月)转引自[日本]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⑤《东京日日新闻》明治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⑥[韩国]金得槐:《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⑦⑧[韩国]金得槐:《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⑨《韩国宗教史》第261页。

⑩⑪转引自《基督教与近代中韩社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汇编》第68页,第11页。

⑫⑬伊藤博文:《秘书类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七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7、第35页。

⑭⑮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第3页。

⑯⑰⑱《韩国宗教史》第337、第336、第336页。

⑲《韩国宗教史》第342页。

⑳《东学党檄文》,转引自《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14页。

㉑《东京日日新闻》明治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